

主编 / 陈启智

儒学

与

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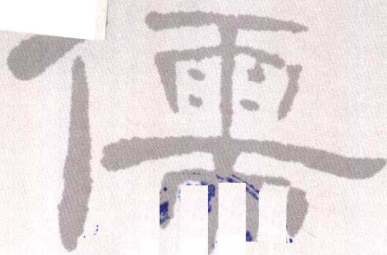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儒学与全球

主 编：陈启智

副主编：孙聚友 张树骅 翁惠明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与全球化 / 陈启智 主编.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2

ISBN 7-5333-1253-8

I. 儒... II. 陈... III. 儒学—关系—国际化—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371 号

儒学与全球化

陈启智 主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0.875 印张 2 插页 524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253-8

B·162 定价: 40.00 元

前 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全球化提出的许多问题，如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发展的关系，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儒学的价值和面临的问题等，已经成为政治界、学术界、企业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意义。正是在这一形势下，2002年8月11日至13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山东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来自韩国、美国和台湾、香港、大陆各省、市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近百篇论文。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着“儒学与全球化”中心议题，就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发展的关系、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儒学的价值及面临的问题、儒学的现代性与普世化、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与异质文明的对话、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学关系的反思等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交流了彼此的观点，展示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对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和实践，产生积

极的推动作用。为了促进“儒学与全球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决定将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结集出版。

目 录

王殿卿: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1)
安秉杰:儒教共同体与世界化	(21)
汤恩佳:儒学与异质文明的对话	(27)
黄万盛:全球化的发展特点与儒学的未来命运	(34)
钱 逊:全球化背景下儒学的发展	(49)
赵骏河:儒家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	(59)
唐亦男:儒家思想与全球化趋势	(64)
陈 来:儒家与全球化中的人权对话	(75)
陈启智:儒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	(88)
张 践: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105)
彭国翔:化解全球化过程中宗教冲突的儒学资源	(108)
赵成植:全球化与儒教文化	(125)
周世范:论全球与文化多元发展的同一性	(132)
邱增雄:儒学与全球化	(136)
刘示范 李焕明:“普世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论语》的道德哲学	(140)
牟钟鉴:儒家中庸之道与人文理性精神	(160)
丁原明:原始儒家的交往观	(168)
蔡德贵:再谈儒家伦理的普世化问题	(182)

颜炳罡:儒学与人类文明相处之道	(196)
李海英:世界化与孟子的王霸论	(215)
王其俊:孟子思想的现代启示	(219)
吴 光:全球化趋势下儒家价值观念的 普世性与现代性	(226)
蒋国保: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	(237)
许耀惠:儒学的现代性与普世化	(253)
林东生:儒学的现代性与普世化	(256)
王文东:儒学传统中的信用伦理与全球化 趋势下的人类交往	(271)
田辰山:儒学与“个体认同”	(292)
黄君良:香港的德育与儒家思想	(307)
刘东超:世界历史·全球化和儒学运动	(323)
李润和:浅论东亚世界与东亚价值在实践中的歧变	(336)
刘宗贤:当代东方儒学复兴的启示	(345)
郭 沂: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儒学复兴	(360)
张树骅:儒家天人观及其借鉴	(367)
洪胜杓:儒学与现代社会的疏外	(379)
李明友:儒学与全球化	(388)
黄 钊:论儒家的社会理想及其在当代的现实价值	(392)
金德钧:通过梁漱溟的东西文化比较论看 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	(395)
孙聚友:论先秦儒家社会秩序观的现代价值	(410)
余同元:儒家读经教育及其现代意义	(420)
崔亨植: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与儒家的价值	(429)
刘爱英:孔子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	(446)
孙熙国 孟 洁:全球化与儒学发展的新契机	(452)

路德斌:全球化与儒学的宗教化思潮(提纲)	(473)
孔令宏:从儒学看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现代化 与后现代化(提要)	(480)
宋义英 钱耕森:略论儒学的和平经济思想与经济 全球化发展中的道德价值	(487)
苗润田:科技发展的动因是什么	(496)
张树骅:“中和”思想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501)
徐儒宗:与时俱进的时中思想	(507)
李世忠:论中庸的本真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523)
梁宗华:汉字与儒学的传承	(534)
叶瑞昕:清末五十年间儒家伦理思想的传承与转化	(552)
潘华琼:五四运动以来儒家伦理的变迁及其在 中国士人和农民中的命运	(571)
肖美丰:解读学统	(591)
李圣炎:为什么中国落在了后面	(610)
潘德荣:“听”与“观”	(613)
何劲松:李朝前期的排佛运动述略	(614)
樊文礼:“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	(622)
任文利:全球化语境下儒学的一种存在方式	(637)
杨晓伟:全球化之两面性与儒学的机遇和挑战	(639)
宋士昌:“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642)
杨 波:在青岛“儒学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645)
张树骅:在“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648)
许金题:“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辞	(649)
刘示范:“儒学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653)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王殿卿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考证,认为西方民主孕育和诞生的历史阶段,就已

经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

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 17—18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 20 年的飞速发展,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鸦片战争以后的 100 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一种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让我们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21 世纪的中国,要进入富强、民主、文明的新阶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在 1997 年 5 月 26 日一个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既努力实现自己的经济腾飞,又努力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耶稣会士向欧洲传播儒学 200 年

早在 100 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曾经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

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的杠杆。”

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为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进而发现新大陆、建立海外殖民地,提供了技术和武器。1492年,哥伦布从欧洲航行到了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1521年,麦哲伦又从美洲到达了菲律宾。此后,中国与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改自古“丝绸”一条陆路的历史,在16—18世纪进入了一个通过海路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正是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的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他们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有人说,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新大陆,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发现了东方文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也影响了西方的现代文明。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一次传播是在唐朝“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即627—649年。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从波斯到中国传教,被称为景教。

第二次传播是景教在元朝(1271—1368年)的复兴和罗马天主教来华传教。其影响只在蒙古族中,因此,它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

第三次是明清之际16世纪末到1789年耶稣会士来华传教^①。

第四次是1840年之后的传教,这是在西方列强侵华的枪炮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74页。

声中、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因此它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

因此,不是所有来华的传教,都具有文化侵略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调整的文化观。文化的传播历来是双向的,究竟哪一种文化能够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哪一种文化能否轻而易举地吞噬另一种文化?这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1598年利玛窦在中国把“四书”译成西文,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是儒学对欧洲影响日甚的200年。其中,前100年是以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沟通东西文化为开端;后100年则是以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与中国清朝皇帝康熙进行“对话”为起点。

1582年,利玛窦随范礼安等耶稣会士,从印度果阿出发来到了澳门,经过严格的中国语言、文化训练之后,于1583年9月10日,取水道沿西江而上,进入当时为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肇庆。从此,基督教开始了第三次向中国传播,也就揭开了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新篇章。

利玛窦于1601年,应明万历皇帝之诏住进了北京,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在中国传教历经艰辛,前后长达28年。

利玛窦在华期间,用了很大的精力潜心研读儒家经典,李贽说利玛窦“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请明于四书性理者解其大义,又请明于六经疏义者通其解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个“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的“极标致”之人^①。利玛窦企图从这些经典中寻找“儒耶对话”的切入点,探讨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可能性。

利玛窦认为:“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是孔子。这位博学的

^① 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 551 年,享年 70 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又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孔子是中国的圣哲之师”,因此,“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利玛窦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四书”“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四书”“是所有想要成为学者的人必须背熟的书”。基于这种认识,他于 1598 年与人合作,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以帮助在华的传教士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利玛窦还在 16 世纪的中叶,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译为西文。他把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思想传到中国,使中国人打开了眼界。同时他又把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传给了欧洲。《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圣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利玛窦是欧洲汉学家当之无愧的始祖,他对于欧洲的汉学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然而,从 16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中叶这一百余年,中国的儒学在欧洲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只有到了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末这一百年,在欧洲才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热”。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 年)执政期间,为了借助耶稣会的传教士在中国打开的局面,于 1685 年(清康熙二十四年)1 月 28 日亲自签署任命书,从国库中拨款 9200 镑作为年俸,资助白晋等 6 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身边的“教师”和“谋士”,因而,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

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白晋著《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1940年再版),此书的序言,包含了许多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而在300年后的今天,他的预言惊人地变成了现实。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过,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著作,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

欧洲 100 年的“中国文化热”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从1685年到1789年,终于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法国文学史创始人居斯塔夫·朗松认为,1680—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换时期。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欧洲思想有以下6个要点:

1. 要求有清晰的和有条理的思想,关注事实和经验,既不向偏见,也不向权威让步,一个人为他自己寻求真理;

2. 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因此,所有地方的善人,与种族或宗教无关,从根本上讲都有同样的道德原则,并且个人可以自己判断善与恶,总的来说,善就是“中庸之道”;

3. 善和乐是一致的,人们不应该去寻求消除,而是要引导他们的欲望。这强调的是此世的享乐,来世的赏罚消失了;

4. 善,并不是如后来卢梭主张的,本来就有的,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

5. 快乐的哲学被扩展到了互惠的地步,由此,一个人会认为,要使他自已幸福,就需要使别人幸福;

6. “仁慈”的美德要被“人道”的美德所代替^①。

应当说,这6条思想在《论语》中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都能够找到“有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如第6条,就是用“人道”取代“神道”,用儒家的美德替代基督的美德。

这些新合成的智慧,为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

^① 顾立雅:《孔子中国之道》,第374页。

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哈)、魁奈、歌德、克斯奈……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霍尔巴赫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①。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1694—1778年),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又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②

伏尔泰读了传教士巴多明(在华时间:1728—1740年)的通信之后认为:中国文化传播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还

^① 顾立雅:《孔子中国之道》,第368页。

^② 顾立雅:《孔子中国之道》,第369页。

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候,“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①。

伏尔泰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②。

法国哲学家霍尔把赫(1723—1789年)与狄德罗(1713—1784年)、爱尔维修(1715—1771年)同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③。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被称为“在欧洲,除了莱布尼茨之外,还从未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对新儒学感兴趣”。他在1672—1676年期间,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4年,这是他能够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对于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哲学“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

① 《伏尔泰全集》,1865年版,第25卷。

② 《伏尔泰全集》,1865年版,第27卷。

③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